

一、总 论

语言学分科和多角度研究语言

在人类科学史上，既没有最终的理论，也没有僵死的、孤立的科学。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在历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中，科学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形成极为丰富的现代科学体系。语言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关键科学，语言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早在公元 10 世纪初，中亚细亚科学家法拉比在其简单的科学分类中，就确定了语言学的位置。当时他把科学大分为语言学、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政治学。后来在培根、洛克、狄德罗、安培、库尔诺等人的科学分类体系中，语言学都占有一定的位置。根据客观世界发展的原则进行科学分类，语言学是科学体系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之一。在劳动创造了人，同时创造了语言和思维的关节点上，科学研究的对象从自然领域转入社会领域。因此，语言学与众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有密切联系。到了现代，由于语言教学、机器翻译、信息处理、跨文化言语交际等应用领域向语言学提出了迫切任务，又使语言学与众多的现代科学发生密切关系，促使语言学获得更快的发展。

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刻，理论应用越来越广泛。许多学者从特定的方面研究语言，从不同侧面探究语言的奥秘，使语言学日益繁荣，异彩纷呈，语言学分科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语言，成为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传统语言学，为了解释经典文献而研究汉字，并透过汉字，研究它表达的汉语语音和语义，形成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分科。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从当时的苏联到中国，都研究俄语或

汉语的三要素，形成语音学、词汇学和语法学学科。那时候，语义学没有分化出来，只在词汇学中研究词汇意义，语法学中研究语法意义。这语言三要素的研究及其相应分科，一直影响到现在的语文教学和外语教学。结构语言学以形式方法切分语流，切分到最小的音义结合的单位（语素）再切分到语言的最小单位（音位）继而研究语素和音位的分类、组合，形成结构语法学和音位学。结构方法的形式切分切到音义结合的语素，从而冲淡了词素和词的界限。例如，布龙菲尔德把 *Poor John ran away*（可怜的约翰跑开了）一句切分为 *poor/John/ran/a/way* 五个语素，分不出词（*poor, John, ran*）和词素（*a, way*）的界限，从而也冲淡了词（*away*）和词组（*poor John*）的界限，有的只是语素及其序列，因而也就无所谓词汇学。转换生成语言学以句法为中心，切分句子的短语结构，在深层用语义解释句法，在表层用语音解释句法。句法部分生成各个结构，通过语义部分和语音部分把结构与语义、语音联系起来。于是形成句法学、语音学、语义学。这种分法，在当前外语学界有相当影响。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研究语言符号自身之间关系的学科称为句法学（或语形学），研究符号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学科称为语义学，研究符号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学科称为语用学。这种划分对中国语言学界也有较大的影响。

从简单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各个语言学派在其研究中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们都是从特定的方面进行研究，往往注意了一些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些方面，甚至有意无意间否定了另一些方面。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不同方面、不同侧面进行研究，从总体上说，他们的研究是互相补充的。

当语言学研究进入言语领域时，语言学者不仅研究语言体系本身，同时还研究使用语言的过程和结果，研究言语活动、言语机制、言语环境、话语建构、话语理解，乃至话语本身，形成话语分析、话语语言学、语境学、语体学、言语修养学、语用学、现代修辞学等

分科。

言语研究与语言体系研究也是互补的。没有社会公认的、客观存在于社会集体之中的语言结构体系，便无所谓语言的使用。语言如果没有社会群体为了交际目的的使用，就会停止发展，成为死语言。语言研究要兼顾这两个方面。以修辞学为例，它要研究语言单位的修辞色彩，研究语言体系中的修辞手段，更要研究这些语言描绘手段和表现手段在言语活动和话语中的修辞效果。语体和风格的研究，已经重视了话语整体，重视了言语方面，这是正确的。但是，语体离不开语言单位的语体分化，风格离不开语言的风格要素。一种不发达的语言，由于缺少科学术语和必要的表达手段，即使社会需要也难以立即形成科学语体。当然，社会交际的需要可促使语言体系的丰富发展，加速相应语体的形成。没有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等语言风格要素，很难形成婉约的或是豪放的言语风格。所以，语言修辞和言语修辞是互补的。在言语交际中，有了对语言材料的选择，才能用于相应的话语组合；有了恰当的组合，才能使语言材料的修辞功能得以实现。所以，语料的选择和话语的组合也是互补的。语言研究和言语研究的这种互补性，证明单纯分析语言结构体系有不足之处。结构语言学和一些语法流派主要用形式方法对语言体系进行分析和描写，也显示出不足之处。

针对形式主义分析的不足，许多学者对语言进行功能主义的分析也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正像我在《论语言的调节功能》一文中所说：“语言功能的发挥，离不开语言的形式规则和规范。”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出路是形式和功能的结合，语言和言语的结合，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研究而又相互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共同揭示语言的本质。只有这样，当代语言学才能获得更大发展。”

不可否认，结构语言学对语言结构体系进行的分析和描写对语言学的贡献很大；在结构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结构主义外语教学论对语言教学也起了推动作用。但是，现代语言学像不满

足于它的形式主义一样，也不满足于它对语言结构体系进行的静态的、封闭的描写。现代语言学进一步在言语中对语言进行动态的、开放的分析，既研究言语本身，又研究语言的动态发展。于是，建构语言学及与之相应的建构主义语言教学论应运而生。人在交际中不断建构新话语的同时，也以其言语创新不断建构语言体系；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也在不断建构个体的语言体系，与社会公认的语言体系逐渐相适应、相接近，达到对语言的掌握。我在《论建构语言学》一文中说过：“结构体系实际上是建构的一个阶段，而建构的阶段性和建构的连续性是统一的。建构的阶段性的性质，以保证社会交际的需要；建构的连续性又使语言结构不断变化发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交际的需要。”“所以，结构是静态的，一定历史时期的语言结构体系有其相对稳定的、封闭的性质，各个结构成分都具有自己的规范。建构是动态的，通过实际的言语交际，在建构无数新话语的同时，不断以话语中创新成分丰富语言体系。”“语言结构和语言建构处于相互作用之中。”

语言建构和语言丰富发展的源泉是语言的各种微观变体，包括言语中的创新成分。过去的语言研究，重点是宏观语言的标准体系，不怎么重视语言中的微观变体，特别忽视偏离语言规范的变体。我认为，语言不仅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的体系，而且是处于一定相互关系之中的各种微观变体的总和。微观变体和宏观语言体系在功能上是互补的。例如，现代汉语中的港台用语变体，既有地域因素，也有一定的社会因素。这些变体成分既已存在，就要因势利导，在提倡使用共同标准语的同时，充分发挥微观变体在交际中的补充作用，并且吸收变体中的有用成分，促使共同语丰富和发展。我发现，由于近年来大陆同胞与港台同胞的交往日益频繁，许多港台用语已被汉语共同语吸收，并在大陆地区广泛使用。例如“心态、共识、认同、研讨、爆满、曝光、代沟、界定、迷你、派对、评

估、生猛、知名度、转型期、自助餐、价值观、大众传播、人际关系’等等。所以，用微观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无疑又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角度。

每当语言学家从一个新角度去研究语言时，就会得出新的看法、新的理论观点，并建立新的学科。当布拉格学派等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研究语音时，发现语流切分后的最小语音单位——音素不仅是空气介质的振动，也不仅是发音器官动作的结果，它还执行一定的社会功能，于是形成音位的概念。音位是语音体系中具有辨别词义功能的基本单位，是言语线性切分的最小成分，词素、词等表义单位由它构成。音位又不是最简单的成分，它本身由一系列共存的区别性特征组成。对音位的研究结果，形成了音位学。当音位学从语音学中分出时，有人担心这样会把音位和语音割裂开来，语音学只研究语音的生理、物理属性，不去考虑意义；音位学只研究语音的功能，不注意发音方法，等等。语言学的发展证明，这种担心毫无必要。事物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为有联系，在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可以对客体进行综合研究；因为有区别，科学发展到另一阶段，也可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建立新的分科。音位学建立之后，既研究与音素的辨义功能有关的音段音位，又研究与音节、音词、音句的辨义功能有关的超音段音位。后来，又把前者称为音位学，把后者称为韵律学。韵律学又从音位学中划分出来，现在又把音位学和韵律学合称为音系学。当然，有人可能一时不适应新的学科，要容许有一个认识过程，学科本身也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整个科学发展史是一部科学分化和科学综合相统一的历史，每一次分化或综合都会产生新的学科。

科学研究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研究物质运动形式和思维形式。客观世界是无限可分的，物质运动形式和思维形式是无限发展的，加之，客观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科学研究，从而建立新的学科。语言学就是从不同角度深刻

研究语言而获得发展的。

语法学中的词法学最近几年受到忽视。在前述的“句法学、语音学、语义学”和“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分科体系中均无词法学的位置。这也许是由于一些学派不区别词内的组合和词外的组合的缘故。如结构语言学只研究语素及其序列，没有词的界限，也就谈不上词法；又如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句法规则既适用于词组和句子，又适用于词的结构，也就无所谓词法了。现代语言学中甚至有人把语法当作研究句子结构模式的分科。另一个原因是，有些研究分析语的学者，特别是研究汉语的学者，认为分析语形态不丰富，因而词法可有可无。诸如此类的看法无疑是减少研究语言的角度，不利于语言学的发展。实际上，词法学是语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词的内部结构、词形变化和词的语法分类。由词素组成的词是语言单位，由词构成的词组、以及由词和词组组成的句子则是言语单位。性质不同的现象应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有不少学者仍然重视词法学，他们在研究词素变体时结合音位学的原理，建立了一门词素音位学（或音位形态学）。它研究词素的音位结构、音位交替等。例如，俄语词 вода（水）有两个词素，一个是词根 вод，一个是词尾 а，词根中的辅音 [d] 位于两个元音之间，是浊辅音、硬辅音，这是该音位的典型变体。这个词的复数第二格形式是 вод，在这个词形中，词尾的辅音发成清辅音 [t]。而在 водяной（水的）这个词中，该词根的辅音 [d]，因为处于表示前置软辅音的元音 я 之前，要发成软辅音 [dʲ]。我们知道，现代俄语中的清浊辅音和软硬辅音都可以区别词义，是独立的音位，不是同一音位的变体。但此例中同一词素中的音位变体跨越了音位的界限，而它们构成的又的确是同一个词素。显然，为了保持词素的同一性，这里把三个不同的音位当作一个音位的三个变体。这就是词素音位学的分析。只有在语言学内部，在词法学和音位学之间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让音位的对立让位于词素同一性的

保持。

近几年，由于对区别于客体意义的民族文化含义进行研究，建立了一门国俗语义学，阐明语言体系内部的文化因素。例如“杜鹃”一词除指称杜鹃鸟和杜鹃花的客体概念意义外，还有“思国、思乡”“思归、催归”“泣血悲思”代称“帝王”布谷促耕”象征“春天”等民族文化意义。研究这种意义对语言学的发展，对正确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均很重要。

由于客观现象之间，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科学之间就不可能有绝对的界限，就必然存在过渡领域，就可能在认识深化时建立边缘学科。在科学分类体系中，化学的位置介于微观物理学和宏观物理学之间。19世纪，在化学和宏观物理学之间形成一门物理化学；20世纪初，又在微观物理学和化学之间形成一门化学物理。此外还有生物化学等等边缘学科。语言学也是这样。我在1983年出版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一书中曾说：“当代语言学发展的总趋势是向社会语言学、工程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三个方面的纵深发展，引起语言学研究的深化和语言学理论应用的广泛化”；“人们从语言体系、言语活动和言语机制三个方面越来越深入地认识语言的本质。”1985年我在《谈点社会心理语言学》一文中又说：“当代语言学又出现一个明显趋势，就是用社会心理语言学、社会信息语言学等第二代边缘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作为交际单位的话语，探索组织信息、有效传递信息，使社会信息畅通的方法。”如前所述，语言与很多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密切联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第一代和第二代边缘学科将会继续出现。社会语言学考虑了使用语言的客观语境，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考虑了使用语言的主观机制。当进一步考虑到交际者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时，第二代边缘学科——社会心理语言学便应运而生。当把社会心理语言学原理用于言语修养时，又会形成社会心理修辞学。这种对语言现象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大

大丰富了现代语言学体系。

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来说，任何科学理论都扎根于实践之中。因此，科学研究在进行理论概括的同时，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这么一来，任何理论科学就可能有它相应的历史科学。语言学就有相应的语言学史和具体的语言史。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必须考虑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问题。这么一来，任何理论科学都可能有它相应的应用科学。如前所述，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刻，理论应用越来越广泛。不久前，我为《全国优秀英语学术论文集》的题词说：“现代语言学的中心任务是发挥语言的调节功能 提高人的言语修养和言语交际效果 促进人机对话。”由此可见 现代应用语言学有人际交际和人机对话两大应用领域，要求把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原理因时因地制宜地加以有效应用。应用语言学一方面要应用理论语言学的成果，另一方面要研究应用过程本身，研究言语交际和跨文化言语交际，研究机器翻译和自然语言处理，研究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研究词典编纂和翻译，研究文字创制和改革，研究失语症治疗，等等。每个领域的研究都可能产生相应的应用语言学分科。当前 词典学、翻译学、对外汉语教学论、外语教学论等学科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应用语言学从实际应用的角度研究语言，常常为理论语言学提供新的课题，促使理论语言学更快地发展。

现代语言学越来越重视双语和多语的研究，从双语的角度，通过双语比较、对比、翻译和信息转换得出的普遍的语言规律，能更深刻地揭示语言的本质。语言学的有关分科，如历史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翻译学、外语教学论、词典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国俗语义学等，都以不同的方法研究双语现象。历史比较语言学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寻找亲属语言的共同来源。对比语言学对任何双语进行共时的对比分析，寻找两种语言体系的异同。翻译学在语际信息转换中观察双语现

象，在话语中对比两种语言单位。外语教学论研究外语教学过程中本族语的地位和作用，处理双语关系。词典学力求提供双语词典中两种语言词语的等值对应。社会语言学从社会角度研究社会群体中功能上互补的双语现象。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研究个人掌握双语的神经心理机制。国俗语义学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语义，特别重视跨文化的双语研究。凡此种种都说明从双语角度研究语言的重要作用。我在给《英汉对比语言学》写的“序”中说：“有不少知名语言学家是本族语专家，他们对本族语的精湛研究，为语言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更多的知名语言学家是通过本族语、外语和双语现象的卓越研究而对语言学做出其贡献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重要结论：第一，必须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语言，才能深刻认识语言的本质，充分发挥语言的作用，使现代语言学得到繁荣和发展。第二，语言学家应尽可能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特定课题的同时，要立足于全局，高屋建瓴，并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相互学习，互相补充，共同完成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任务。

（原载《外国语》1996年第5期；
香港《亚太语文教育学报》创刊号1998年3月）

论语言发展的规律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到现在，语言学著作和教科书中谈到语言发展规律时 往往只举出“语言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和“语言发展的渐变性规律”两条。这两条的确是重要的规律。但是，语言发展的规律决不止这两条。现把我关于语言发展规律的一些想法提出来 供大家参考。

语言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语言发展规律所涉及的不是个别语言事实，而是语言发展的一般趋势。语言功能发展的规律主要有：语言的分化和统一的规律，方言向民族共同语集中的规律，方言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规律，标准语的形成和作用扩大的规律等等。

语言体系发展的规律，有的涉及语言体系的一般特点，适用于一切语言，如语言各结构部分发展不平衡规律，语言体系发展的理据性规律，类推规律，抽象性规律等等；有的则只涉及某个语言结构部分的具体变化，适用于某些亲属语言或某种具体语言的一定发展时期，如汉语历史发展过程中语音单纯化的规律，词汇双音节化的规律和语法上词序定型化的规律等等。语言体系的发展同语言功能的发展密切联系，有一些规律既在语言体系发展中起作用，又在语言功能发展中起作用，如语言发展的渐变性规律等。现在分析几种主要的规律。

1. 语言体系发展的理据性规律

事物的名称同事物本身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人在交际中给事物起名称时，用什么语言形式代表该事物这是任意的。任何名称一旦获得社会公认，就可以约定俗成。但是，在语言发展的漫

长过程中，大多数语言单位的产生，在语言体系内部是有理据性的。

语言单位理据性的例子很多。例如，汉语的“雪花”一词代表石蒜科鳞茎植物的雪花属的一种花。这种花早春开花，破雪而出，“雪花”名称的基础就是这个特征。尽管这个特征不是这种石蒜科鳞茎植物的本质特征，但它作为取名称的标志，在汉语体系内部是有理据性的。“雪”和“花”是汉语中众所周知的语言单位，用它们构成新词，可以“顾名思义”，大体想象出所代表事物的模糊轮廓。这比用一个与现有语言单位毫无联系的声音来命名，显然更有利于交际。试比较一下其他语言中表达这一事物的词，是饶有趣味的。英语是 snowdrop（字面意思是“雪滴”），这个词也以“雪”（snow）作为标志，但却是新的词素搭配。俄语是 подснежник（字面意思是“雪下物”），这显然因早春满地积雪时，此花长于雪下（под снегом）而得名。德语是 schneeglöckchen（字面意思是“雪钟”），它也同“雪”（schnee）相联系，但加上了“花形如钟”的补充特征，形成新的词素搭配。法语是 perce-neige（字面意思是“穿雪而出”），这个词也同“雪”（neige）有关，但更形象地说明了“破雪而出”的特征。这个例子说明，事物名称同事物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名称的标志仅仅是一种惹人注目的特征，让人们通过这个特征想象事物的整体。但在某一种民族语言体系内部，新的语言单位有明显的理据性，人们在命名时自然地考虑到理据性，而不是任意用毫无联系的声音来代表事物。这对发挥语言交际功能十分必要。由于事物名称同事物本身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各种语言显示出差别性，表现出语言的民族特点，如上例中各自强调“长于雪下”、“花形如钟”、“穿雪而出”等特征。由于语言单位在语言体系内部有明显的理据性，各种语言又显示出某种共同性，出现了语言的普遍现象，如上例中各语言的词均同“雪”相联系。

现代语言是长期历史发展而来的，同人民的历史和思维密切

联系，所以，语言单位的理据性成为保证语言成为交际工具的必需条件，理据性成为语言发展的重要规律。

2. 语言发展的类推规律

类推规律就是语言按类推而变化，即一种语言事实按其他事实的特征类推而改变自己的结构特征。这条规律在所有语言的一切发展时期都起作用。

在一种语言体系中，同类语言现象达到一定数量就可归纳出规则，这种规则类推到其他语言事实，就是规则的使用。原来不规则的少数语言现象被类推到多数现象，就逐渐成为规则，并取代原有规则而引起语言变化。规则形成后再类推而用于更多的现象。

类推规律在语法和词汇中都起作用。例如在俄语口语中，有中性名词不变格的趋势。一开始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如有少量不变格的外来词 кино(电影院), пальто(大衣)等。又如苏联有两个城市，一个叫 Пушкино(普希金诺市)，一个叫 Пушкин(普希金市)，两个词的第六格形式相同，如果说 в Пушкине，既可理解为“在普希金诺市”，又可理解为“在普希金市”。如果在军事文件中出现这种歧义，就会贻误军情。所以在苏联卫国战争时的军事情报中，Пушкино 就不变格。这种既简便又准确的用法，很快类推到其他的中性名词。先是中性地理名词，如 жить в Чадаеве(住在恰达耶沃), доехать до Бородино(到达鲍罗金诺)等。现在又有类推到中性普通名词的趋向，如 окно(窗户)、долото(凿子)等，在口语中有时不变格，先是口语采用，后来会逐渐类推到书面语。

一个语言单位受别的单位影响进行类推变化时，必须具有同该单位类似的特征，如上例的中性名词特征。很多新词语和搭配形式是按照相似词语和搭配以类推的方式产生的，如“新闻——旧闻”“，无的放矢——有的放矢”“，帮忙——帮闲”“，国际关系——人际关系”“，空气污染——精神污染”等等。

由于类推是按照语言中已有类似现象而形成，语言发展的类

推规律同理据性规律是有联系的。

3. 语言发展的简化规律

又称为语言发展的经济原则。任何语言总是向着简单、经济、便于交际的方向发展的。各种语言中大量缩略词语的涌现，是简化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一些常用的代表重要概念的词语最容易产生缩略词，如“中国共产党——中共”；“人民代表大会——人大”等等。现代汉语中“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为“四个现代化”再简称为“四化”是最为明显的例子。现代主要语言中，词的缩略成为重要的构词法，例如，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缩为 U. S. A.（美国）；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缩成 СССР（苏联）等等。把表达同一内容的不同语言手段统一为一种手段也是语言经济原则起作用的结果。例如俄语的阴性名词第五格原有两种词尾，-ой(-ей)和-ою(-ею)现在-ою，-ею形式已罕用，通常只有-ой，-ей，如 под книгой（在书下面），капля за каплей（一点一滴地）。一些没有意义差别和修辞分化的同义词、在简化规律的作用下，往往只保留一个。如“德律风——电话”；“德律风”先借入汉语后来又产生了新词“电话”两个词意义和修辞色彩没有什么差别，“德律风”便逐渐被“电话”代替。同理，“联合收割机”代替了“康拜因”。但是有了意义差别和修辞分化的同义词不仅不会被淘汰，而且是词汇丰富的表现，这就是另一条规律——语言发展丰富化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4. 语言发展的丰富化规律

语言发展总是越来越丰富，语言发展的丰富化规律同语言发展的简化规律是辩证统一的。首先，语言简化的结果促使语言丰富化，如大量缩略词语的涌现对这个词语本身说是一种简化，但对词汇体系说却又是丰富化，缩略词和全称词语构成了同义手段。其次，同义手段在意义和修辞色彩上等同就要简化，同义手段在意

义和修辞色彩上出现分化就是丰富化的表现。

语言发展丰富化规律主要在词汇和语义层次起作用，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词汇不断丰富，语义不断充实。有些多义词的义项达几十项之多，如汉语的“打”、“搞”英语的 to do, to be 俄语的 идти, делать 等等。在语法层次，新的构词模式和句法结构不断增加，语法意义和形式不断丰富。但在语音层次，这条规律不大起作用。

5. 语言发展的抽象规律

语言结构成分抽象化的规律在一切语言中都起作用。在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较为具体的语言事实转化为抽象的语言事实，抽象的程度不断增加。例如，在词汇中抽象意义在具体意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锻炼”的意义原来是“锤打火烧的金属”，“钢铁”的意义原来是“黑色金属”，这种意义都比较具体。在具体意义的基础上，这些词的转义逐渐抽象化，如“锻炼身体”“锻炼意志”“锻炼思想”“钢铁般的拳头”“铁的纪律”“铁的意志”等等。有人把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作冶金学著作，就是没有注意词的转义和词义的抽象。实词虚化，也是语言发展抽象化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在”表示“存在”是实词，如“留得青山在”“精神永在”。虚化为介词后表示关系意义，如“事情发生在星期二”“在教室上课”。俄语前置词 благодаря(多亏，由于)是由动词 благодарить(感谢)虚化而来(благодарить的副动词形式是 благодаря)，如：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я спасся благодаря вам(谢谢您，多亏您我才得救了)。

在某些印欧语言的词法中，在性的类别意义的基础上发展了名词性范畴的抽象意义；在句法中，在时间、人称、式等意义的基础上发展了谓语性、情态性等更为抽象的意义。这些都是语言发展抽象化的表现。

由于语言结构成分抽象化规律起作用的结果，现代发达语言

的词是语言意义四级抽象的代表，即词汇级抽象，构词级抽象，词法级抽象和句法级抽象都表现在词上面，不过词只在句法结构中保留句法级抽象意义。概括地说，语言中有词汇级抽象和语法级抽象。在词汇意义上，每个词都是概括的，表示一类事物；语法意义更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的成果，是从具体的词句中抽象出来的。

6. 语言发展的概率规律

语言体系中有很多数量关系，语言单位在言语中出现有一定的频率，语言的发展不是像水到 100℃沸腾汽化，到 0℃结冰那样有硬性规律，而是遵循概率规律。语言中有些词很常用，有些词很罕用。一种语言的词汇多达几十万，但只要掌握四、五千常用词即可进行交际。

词的使用频率同语义有关。例如，虚词的出现频率很大，单义的专门术语的出现频率很小，多义词使用频率中等。

词的义项同频率的相互关系可用数学公式表示，一个词意义的平均数 m 等于它的频率 F 的平方

$$m = \sqrt{F}$$

词义的历史发展遵循一定的概率规律，现举例说明。拉丁语词 *testa* 的意义开始是“瓦罐”，后来逐步获得“头”的意义。如在法语中 *tête* 具有“头”的意义。这种词义的转换经历了漫长的时期。第一个意义的使用频率逐渐减少，第二个意义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第二个意义原来是第一个意义的用法，后来成为意义，使用频率超过了第一个意义。语言事实的消失通常是由逐渐少用到罕用而消失，有一个使用频率降低的过程。新义的产生也多半是由修辞隐喻，到用法到意义，再逐渐常用；新词的产生也多半是从个人新词，得到公认进入词汇体系而逐渐常用。都有一个使用频率增加的过程。

由于概率规律既是语言历史发展规律，又是语言共时作用规律，概率论和统计学的方法便成为语言学的重要方法之一。语言